

## 第一章 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理论”

编者按：这里选录资料六篇，说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所谓“理论”根据是什么。作者们都是资本主义国家有代表性的反动学者。海恩和赖德烈代表欧美帝国主义的观点，内藤湖南和宫崎市定代表日本军国主义者的观点。他们的说教无非是妄想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恶活动作辩解，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政策找寻“理论”根据。

十九世纪以来，外国资产阶级学者把侵略中国的活动，说成是白种人的负担，白种人“教化”中国的责任。他们把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解释为白种人对中国人民的善意“教化”。觉醒了的中国人民早已认识清楚这种说教的反动本质。但是这种强盗的逻辑和谎言，在资本主义国家很有市场，而且在旧中国的知识界也曾经有过一定的影响。

日本帝国主义是后起的凶手。日本资产阶级学者内藤湖南也为日本军阀制造侵略中国的“理论”，说什么中国和日本是同文同种，东亚文化的中心已经从中国移到日本去了，所以日本人应该主宰中国，应该在中国的政治和社会活动中起重大的作用。日本研究边疆史的资产阶级反动学者例如宫崎市定等等更捏造历史，说汉族与北方诸民族的“斗争”是东亚历史发展的主流，每逢汉族文化衰朽的时候（如汉末、魏晋、宋末、明末），便需要北方落后的尚武的民族（如五胡、蒙古、满清）入主中原，带进来“朴素精神”，使汉族返老还童（如唐与明）。他们从而论证说近代中国衰朽了，而日本

是掌握近代科学技术的“朴素”民族，因之負有入主中国，使中国复兴的使命。这种痴人说梦，中国人民看来，十分可笑，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結束以前的日本，却产生了极恶劣的影响。

美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結束以后，妄图代替日本帝国主义独霸中国，把中国变成美帝国主义冒险家的乐园。美国的反动学者例如賴德烈、費正清等等，也創造出种种“理論”，为美帝国主义侵略活动作辯护，胡說美国对中国的政策是美国向西部擴張，越过北美洲大陆的广阔田野时所产生的所謂美国精神的产物，从而論証美国横跨太平洋向东亚各国擴張，是“上帝的启示”和历史的必然趋势。这种美国強盜的邏輯，在资本主义国家仍有一定的影响，它是奴役落后国家的精神武器，我們必須揭穿这种阴谋詭計，并彻底批判这种侵略主义的历史观点。

## 一、海思等：論白种人的負担

自古昔希腊羅馬时起，迄于今日，任人类史剧之主角者，为欧洲之白人。吾人所称之近代文明，皆起于五大洲中最小之欧洲，平民首先胆敢夺取专制君主之政权，民族习知爱国主义；发明家利用自然力以推进鋼铁之机器，轉移人类之舟車；彈药开始为战争致命之武器；科学家以望远鏡考察天体，又发现化学、物理、生物、医药等学之秘密；公立学校及自动印机；学术玄奥，公之于世；凡此种，皆起源于欧洲。

但欧洲之文化，并不秘藏于欧洲。自十五世紀、以迄于二十世紀，欧洲基督教之国家，漸漸傳布其文明于世界各地。吾人在本书

以前各章已述歐洲各國，派遣探險家、傳教師及殖民，以建樹“新西班牙”、“新法蘭西”、“新英格蘭”。總之，建立新歐洲於美洲。澳大利亞及新西蘭，亦復為歐人之新住所。

歐洲文明之擴張，於十九世紀之後半葉與二十世紀之初年，更為廣遠。在此時期，歐洲之白人，開始傳授或強迫傳授有色人種，以採取歐人之文化。大詩人吉卜寧曾謂：歐化落后之種族，乃“白人之負擔。”誠然，是乃負擔，且為重大之負擔，負起責任，領導數萬萬“非歐洲”人，以入於歐洲文化及進步之途。但此項使命之負擔，常因其自私之故，致不甚顧及“非歐洲”人種之幸福。

在十九及二十世紀之中，遠東不進步之黃種人，如何於睡中驚醒，開始接受歐洲之文化，以及愚昧之非洲黑人，如何置於歐人之治下，將依次論述之。

（海思等：《近世世界史》，第591—592頁。）

## 二、內藤湖南：論東洋文化中心的移動

中國革新運動中加入日本力量的問題，不是單由暫時情況而起的，是由東洋文化發展的历史關係產生出來的當然結果。中國、日本、朝鮮、安南等國民的存在，對於各國固然是相當重要的問題，可是由東洋文化發展全體看來，它是微不足道的小問題。東洋文化發展正在超越國民的界綫，沿着一一定的途徑向前邁進。

試觀自古以來各民族間的關係，即可以知道在中國本土原來就不是一個單一的民族，至少是由兩三個以上的民族所構成。此等民族也是由於文化發展，消滅了民族的界綫；而形成為具有同一

东洋文化的一大民族。中国自古以来，文化就不断的发展、移动、前进。自上古时代起至战国时代止，中国文化就是这样发展的。从秦汉以后中国统一以来，文化中心逐渐移动。过去曾经是文化中心的地方渐渐衰颓，从古以来没有文化的地方逐渐发展起来。某某地方又渐渐成为文化中心。例如在汉以前，黄河流域是文化中心；三国以后，文化中心即逐渐南移。由于地理的关系和人力作用于地理的关系，例如开凿大运河，文化中心的移动也受到影响。以往文化即不断往东、又往南移动。南宋以后，中国文化日益往东南发展，近来大致是沿着大运河流域形成文化中心。这些地方的文化过于成熟时，即开发自古以来尚未开发过的地区，如云南、贵州等地区的文化即是后来发展的。曾经是文化中心的地方，唐以前是在河南、陕西一带；宋元间即移转到直隶、河南的东部；及至明朝，江苏、浙江一带文化极盛；最近和外国交通发达之后，文化中心又几乎已经移往广东。由纯汉族的观点看来，江浙地方在中国上古时代原是夷狄之区，广东等省在最近以前仍受着几乎等于外国地方的待遇。由文化中心的移动看来，现在是江苏、浙江地方的全盛时代，将来必有广东地方文化全盛的时代，恐怕中国人对此是没有怀疑的。

如上文所述，文化中心的移动是不问国民的区域如何而前进的。对于接受中国文化决不晚于广东等地的日本，现在正成为东洋文化的中心，日本文化对于中国文化将成为一大势力，乃当然的事理。日本现在是比中国更好的强国，中国人对于日本的兴盛却用一种猜疑的眼光来看。可是假使日本与中国因某种关系在政治上形成一个国家，文化中心移至日本，此时日本人将在中国的政治上或社会上展开其活动，中国人恐不会以为是特别奇怪的现象吧。

此事由漢代中國人對於當時的廣東人、安南人的感情推想起來，即可以明白在東洋文化發展史上，國民的區別本來是一個小問題。中國的極端論者往往發表不可能的議論說：日本若放棄帝政，建立民主國或共和國，中國即可以和日本共同從事東洋文化運動。象中國這樣政治為特殊階級所獨占的於人民利益無關的國家，當有人主張以超越政治的大文化運動表現人民全体的能力於將來之時，尚有人拘泥於日本的國體或政治，則未免過於小氣了。在日本方面，有識人士恐怕也不會拘泥於國體或政治運動，而不與中國合作。應用比政治更為寬廣的文化運動與中國人合作，此乃吾等之目的。

（內藤湖南：《新支那論》，第263—267頁，傅仲濤譯。）

### 三、內藤湖南：論中國的革新與日本

也許中國人會說：日本沒有固有的文化，只是西洋文化的翻譯品。然而現在中國豈不是已掀起轉譯並採用日本人所翻譯介紹的西洋文化的運動呢？有個別中國學者反對這樣做，他們努力直接由原文翻譯介紹西洋文化，然而大多數的中國人仍是由日文轉譯。以上僅舉一目前極明顯之例而已。其實日本一方面應致力於中國文化的發展，另一方面又應致力於革新中國。關於此問題，決非翻譯介紹一些西洋文化就能解決。日本由於五六十年來的努力，在學習西洋文化方面，特別是在推動其經濟機構方面，積累了若干經驗，已經把西洋文化變為最適於東洋口味的文化。有時雖有把大

規模的西洋文化縮小，或把体面的西洋文化变为不体面的傾向，然而东洋的新文化并非完全去掉东洋文化的根干，接上西洋文化的枝桠。乃是采用西洋文化先进的方法，虽然有时須割去某一部分不必要的东洋文化，然而东洋文化的根干仍須照旧繼續保存。……

(中略)

此种运动，在經濟方面虽尚无先例，然而在历史上却曾有好几次其他方面的先例。中国之所以能維持举世无比的漫长生命，其原因全在于此。試观在秦汉以后，中国文化每逢向其周圍的夷狄滲入，其結果均促使夷狄发生民族的自觉，它即成为一种反势力，又加之于中国。汉朝时苦于防御匈奴，是因为匈奴已有民族的自觉，认为它应和中国处于平等地位之故。后来所謂的五胡十六国等等时代，均是一切北方民族因受中国文化的刺激发生了民族自觉心，他們的势力反加于中国之故。由中国人方面說来，中国人因受異族侵入的压迫，逃往南方，中原即为夷狄所蹂躪，此乃一般的想法。然而由另一方面看来，从上古至汉代，中国始終过着大国生活，如无五胡十六国的刺激，中国民族恐早已老死。因混入五胡十六国这类的既清新而又年輕的民族，中国的生命于是又恢复了青春，而产生象唐朝那样的非常美丽的文化。其后又为辽、金、元等北方民族所压迫，飽尝亡国之苦。在亡国期間，中国民族生活的式样一变，于是由国民政治生活轉变为具有世界性的文化生活。其原因完全在于遭受北方民族暂时灭亡了中华祖国的一大刺激之故。

(中略)

中国的論者，特别是近来的論者，似乎以为外族的侵略無論如何对于中国人俱是不幸；其实中国之所以能維持长久的民族生活，

全在於屢次遭受外族侵略之故。由此看來，如成吉思汗所說的“中國人民對於中國毫無用處，不如把他們全部打死，把中國的土地作為牧場，於蒙古人反而有用”。此語至堪玩味。此種外族精神為耶律楚材等深謀遠慮的政治家所緩和，使中國民族能適當地返回青春，誠屬萬幸。在中國人看來，自古以來的外族勢力，全是以暴力實行統治。然而今日的外族勢力卻是在經濟上和平地伸入中國。在東洋文化的發展史上既盡了某一時代應盡之責，又要革新中國現狀的（雖不自覺的）日本經濟運動等對於延長中國民族將來的生命，實有莫大的效果。若要阻止日本的經濟運動，中國民族恐是自找死亡。

就日本革新中國的偉大使命說來，認為此種使命是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或是軍國主義的野心，全是不值一駁之論。特別是所謂的侵略主義、軍國主義云云，單由這問題本身看來，用來討論日本與中國間的關係即至為不妥。常有人說，日本近來有些輿論離開了正軌，有不少的日本人對於國內政治，主張社會主義。這個主義是從各人的生存權出發，一方面有人擁有億萬財富，另一方面又有人苦於不能生存，因而認為可以用武力要求窮人的生存權，這是社會主義的主張。然而單由日本與中國的國際關係看來，一方面象中國人承繼着過大的祖先遺產，且不能為世界各國充分利用其資源，而暴棄了天物；另一方面日本苦於人口過剩而發生國民生存權的問題，却要瞪着眼睛袖手旁觀鄰國人民繼承着過大的祖產，此乃至不合理之事。日本現在的輿論，對內政策與對外政策完全相反。此種荒謬的邏輯，只須稍加研究，即可明白其為不合理之論。

（中略）

更進一步說，“革新中國”，即日本給中國社會組織以新生命的

运动，是否除了日本以外还可求之于其他国家呢？英国对华貿易，如以前屢次所述，是采取不深入中国內地的方針，不但在政治上是如此，在經濟上亦是如此，将来亦采取此种方針，对华政策将无任何变化。此不但是由英国一般对外貿易，特别是由对华貿易看来是如此，即由英国对世界一般的方針看来，亦是如此。其次美国人对华运动亦有与日本不同之点，是应深加注意者。由日本全体人民的发展看来，一般人都把日本对华經濟运动看做是于国民生存有关的問題。然而美国却把对华工作全交给企业家去管，不是出于全体国民的需要。……

原来美国在几无人烟之处，有許多可利用的天然富源来发展其企业，現在要把他們所办的企业拿到象中国这样人口相当多的地方来，获得比美国更多或相等的利益，实是不可能之事。今后美国人将逐年看清：美国在华企业于美无利。然而日本人則与美国人完全不同。日本人由于自己生存的問題，能在中国进一寸便有一寸之利，能取得一分便有一分之利；甚至不把任何利益放在眼里，只要能在中国有吃有喝，即可冒生命财产的危險坚持下去。美国人无论如何不能与中国工人在劳动中竞赛，不能和中国小商人在买卖上竞争，断不能象日本人不怕任何艰苦工作亦可以接受。因此若稍微推想过去未来二三十年間的局面，下一决心把中国的土地让給日本作市場，将非常有利于国际和平。若认为日本十分軟弱可欺，永远继续其镇压日本的政策，日本人既然在朝鮮、滿洲作过决死斗争，将来也能在中国和其他国家作决死的斗争。此岂非将来一大不幸？

（內藤湖南：《新支那論》，第267—279頁，傅仲涛譯。）

#### 四、宮崎市定：論东洋朴素主义和日本向中国擴張的历史使命

**夜郎自大的文明国** 明自建国以来，即以极端的貿易統制主义对待外国。明所謂的貿易乃采取朝貢的方式，置貿易于皇室直接管制之下。明初所制定的統制貿易方法，本欲借此以籠絡各外国；其后因运用不得其宜，反而招惹了过多的外患，刺激了过多的異族敌愾心，以至产生出相反的效果。

明朝的統制貿易，本来違反經濟原則。他們說，中国地大物博，并不需要向外国征求任何必需品，而外国所求于中国的俱为他們所必需。因此中国对外貿易不是平等的，而是給外國的恩惠。沐中原恩惠的外国理应奉中原的正朔，承认上国對他們的主权，服从上国對他們的統治云云。此乃中国朝廷老一套的慣語，世无比此更不合理之事。所謂必需品如是指水或空气而言，則未尝不可。否則，究竟到如何程度方为必需品，或到如何程度，方为不必需品，在何处可划出一条必需与不必需的界綫？因明有所求于外国，方有交易之可能。明的輸出品既然对外国为必需品，外国的产品对明即无非必需品之理。試看明永乐帝以后发动多次南洋远征，究有何求？其目的无非在于追求貿易利益，明岂非为追求必需品，曾远达亚非利加的地角天涯么？由于极端的統制貿易，首先吃苦的无非是明朝人民。后来沿海人民与日本人勾結酿成騷扰，岂非理所当然？明禁止人民航行海外，只許可特別指定的外国来本国港口进行貿易。此时明人与外人同苦于官吏的苛征暴斂。明廷对于

貿易的統制虽严，对于肃清腐敗的貪官污吏却并无任何措施。此种情况对于大陆北方的外国交易亦同。其結果，四百年間保守沉默的滿族憤然而起。古代有“女真不滿万，滿万不可敌”之謠。此語具有可怕的现实性，又重新出現于历史。

**以朴素主义建立滿洲帝国** 在发明了火药，普及了大炮步枪的时代，物力往往压制人力。此时缺乏资源的朴素民族的勃兴和以前不同，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清太祖以少数兵力击败四路征討軍，在滿洲造成巩固的地盘，已是一大奇迹。及至第二代太宗时代，西邻的蒙古族对滿清态度不明。此时滿族，前有明朝宁远的坚城，干戈屡起；内有旱災，連年饥荒；它所招集的中原人又有动搖之意。当此困难时期，滿族能戮力同心，克服困难，逐步前进。由此看来，他們获得最后胜利，可知并非偶然。大凡新势力一旦勃兴，旧势力必临之以泰山压卵之势。兴一家既不容易，何况一国，何况天下。苟不毅然予以反击，即不能前进一步，将不能成为新兴势力。

明已衰老，中原数千年的文明社会早已腐朽，而明代三百年历史更使明朝陷入腐化地步。于是中原文明社会不得不在以六万滿洲八旗为中坚的清朝統治之下，受朴素主义的訓練，重新再建。

明朝三百年間，与蒙古挾长城互相殘杀，連年不断，孰能預料中原之鹿竟入第三者滿族之手。試听清太祖諭蒙古降将之言曰：“我国习俗所尚：守忠信，奉法度，賢而善者举之不遺，悖且乱者治之不貸。以致盜窃潜消，暴乱不作，拾遺于道，必还其主。习俗如此，所以获膺天眷。尔蒙古人所持者念珠，所称者佛号，而不息盜窃之風，遂遭天譴。俾尔諸貝勒自乱其心，殃及于国。今尔等既归我，賢而善者，嘉其賢而优礼之。即不能之人，亦因其归順而善遇

焉。今而后慎勿萌盜竊暴亂之心。倘旧惡不悛，國法不汝貸也。”滿洲人之醇朴，不一定是清太祖的自夸，而有确实的証人。奇哉，其証之者乃一日本人。寬永21年（1644年）越前國之國田兵右衛門等乘船三艘，赴松前，而飄流至滿洲。船員被送往北京，后来經朝鮮回國。是時正值清代明即帝位，極熱鬧之時。國田等歸國后，被召往江戶，隨所尋詢，作見聞錄云：“清國一切法律制度，看來俱格外嚴明。上下俱仁慈正直，絕無欺騙訛詐之事。金銀財物隨意放置，無竊取者。其醇朴誠可感也”。又云：其主仆關係有如父子。主之愛仆，犹如父之愛子；仆之愛主，亦如子之愛父；上下和睦。此等當時目睹者之記述，遠勝于后世清朝御用學者千言萬語歌頌之文句，對於清朝誠為無比之贊辭。然而彼等一談及明朝遺民，忽異其筆調曰：北京人心與滿洲人不同，既有盜賊，又有欺騙，竟無仁慈之心。明人似亦見棄于日本人。日本人以手勢代言語告滿洲官吏云：我日本人重禮義，武力強盛，而富於仁慈。此滿洲官吏云：我滿洲國亦然。該滿洲官吏因而下令款待日本人云云。可見日本與滿洲在朴素主義的訓練上，有一脈相通之處。雖然彼此言語不通，究能以心傳心，惟好漢識好漢。吾人閱讀至此，不禁有無限之感。

明朝不能自治的文明社會，因加入數萬滿洲軍的新興勢力，竟奏平治之奇效。蒙古人對中國的侵略早已停止，中國與日本的關係已予改善，中國疆土因清朝的武力已西逾葱嶺，南及喜馬拉雅山中。現在醫治中國社會的文明病，只有輸入一朴素主義而已。

**朴素主义与科学精神** 东洋自古以来，即由西亚細亞吸取科學知識。漢代即如此，唐代亦然，至宋代不但由陸路上交通西域，

并由南方海上沟通西方，受西方之影响亦甚大。蒙古帝国一旦建立，东西洋交通遂极频繁，吸取西方学术之倾向亦日益显著。然至此，科学文明之中心已由西亚细亚移至欧洲。蒙古人击破薩拉森帝国于西亚细亚之后，残存于西班牙的伊斯兰王国，遂作为西方唯一科学文明之中心遗留下来。这个西班牙伊斯兰王国不久为从北方南下的野蛮的基督教国所复灭。西欧的朴素民族并不轻视作为伊斯兰文明社会的遗产的科学文化，而予以正确的评价，输入自己的社会，使之成长，在世界历史上创一新纪元。在伊斯兰文明社会中已逐渐停滞的科学文化，一经移植于新的土地，为朴素民族的精力所培养，乃有飞跃的发展。由于科学的发达，他们的物质生活乃蒸蒸日上，表面上看来，他们的社会与从来文明主义的社会毫无不同之处，然在其社会内部，原来的朴素主义尚未十分消磨，还在继续其旺盛的呼吸。

欧洲社会表面是文明主义，里面却隐藏着朴素主义的因素，其原因可由两方面来考察。第一，由年龄说来，欧洲社会尚属年轻。东洋的中国、印度、波斯和西洋的埃及、希腊，其社会已经过多次变迁，继续其几千年来的文明主义生活，业已疲劳。西欧的社会自日耳曼民族移入后，即为朴素民族所割据。自此以来，由于十字军的影响，与西亚细亚的文明多少有些接触。然而文明生活风靡西欧，尚在文艺复兴之后，其开始在十三世纪，由东洋来说是在宋末，蒙古勃兴前后，正是中原人已经饱食文明生活，开始发生消化不良之时。由此后的年代起至现在止，尚不过六七世纪，比较其他先进的文明各国，年轻甚多。

第二，欧洲文明是以科学为枢纽发展起来的。在从来的文明社会中，科学亦有时灿然放光。然而科学的进步不久便告停滞，一

停滯便墮落。天文学的知識一发达，便墮落为占星术；化学的知識一发达，不久便畸形化，成为炼金术。其結果文明愈进步，愈成为迷信。迷信之害足以削弱科学之效能。世人有时誤解迷信为野蛮原始社会的特有产物。其实相反，愈是文明古老的社会，积累的迷信愈多；其迷信往往成为頑固的因襲枷鎖，妨碍社会正当的进步。我所說的迷信不仅指七曜吉凶而言，亦指凡无任何根据，外表上似是真理而流行于世的都是迷信而言。然而近世欧洲科学每年进步，每年提高世人对科学的信任，同时亦糾正世人对于社会状况的認識。此时文化科学亦有针对自然科学成为一种新科学的可能。他們一方面不停的进步，一方面不絕的內省，同时不断的批判。五六世紀間，年輕有为的朴素民族有时陷入暮气沉沉的泥坑，此时采取着正确途徑的文化科学又不断的領導社会，把它从墮落的危机中救出来，使它一方面采取文明社会的形式，一方面妥善地保存朴素主义。如此，便复行保证科学的发展，因变为果，果变为因，因果循环以至有今日之盛。科学乃成为使文明生活与朴素主义并立調和的樞紐。

**如何看待西方文化的东渐** 建立在伊斯兰帝国的遺址上的西班牙、葡萄牙，是最初在欧洲开科学文化之花的两个国家。他們是殘留在伊比利亚半島上的基督教国。不久南下，逐薩拉森人于阿非利加。由于采取薩拉森人的科学为自己服务，而繁荣起来。西越大西洋，发見新大陆；东繞好望角，来到旧大陆。

明末，葡萄牙以船舶載科学，來訪古老的东洋文明国，中原文明社会所受影响甚大。若明廷充分認識西洋科学的价值，而努力輸入科学于中原，明代社稷恐不至于灭亡。然而他們的眼睛未免

过于为文明生活所迷，只認識紅毛炮的威力和世界地图的正确，而不認識西洋科学的价值。西洋傳教士虽然異常尽力輸入科学于中原，然科学只是輸入，并未扎下根来。清康熙帝对于科学有正确的認識，朴素民族出身的康熙帝的眼目并未昏迷。然而康熙帝为經營中原已过于紛忙，无兼顧之暇；他制訂一切政策俱以收拾明朝灭亡后的时局为前提，并未触及科学。以帝之英迈，尚且如此。結局，滿洲人比之虽接触过西方科学文明而不理解它的蒙古人，并不如何高明，殊为可惜。此亦想是由于数千年积累下来的中原文明社会迷信的因襲而得之結果。

針对中原文明社会，幸而东洋有一朴素主义的社会存在，即日本。世人有以为日本虽以其文明的古老自夸，只是古老，并无任何价值。然而日本虽有古老的文明，幸而从不拋棄其朴素主义，乃足以向全世界自豪的事实。所謂日本精神，不是以建筑、文学表現出来的日本風味，而是不以言語、行动表現出来的朴素主义的精神。其他一切日本文化的形式，都远离于日本精神的本质。

日本人既朴素而又謙逊；正則为正，邪則为邪，毫无虛假，醇朴天真。对于西洋文明的判断，其正确至为可惊。我們为言語的方便計，說西洋的科学，其实科学并无东西洋之分，只有人类共同的。現在所謂“西洋的科学”，其实是西洋向西亚細亚学来的。原来子向父学，后輩向先輩学，乃自然之理。近代文化后进国向西洋先进国学，亦为自然之理。既为近代文化后进国而不願意向先进国学习；乃夜郎自大的文明主义之通病。后进国并不可耻，以后进国而不学先进国，或虽学先进而不超过先进，实屬可耻。

**日本所保存的朴素主义 中日两国对科学态度的不同 表現**

为以后两国国运的不同。上述日本对科学的态度，不是只对于科学所采取的特殊态度，乃是无任何偏見的朴素态度，用以证明日本社会是立足于朴素主义。同时須知，此种朴素主义，和滿洲人、蒙古人的朴素主义不同，是有发展性的。原来我国人民成功地移植了科学，掌握了如何使文明主义与朴素主义調和的关键。

清朝在东方的衰亡，使吾人联想到土耳其帝国在西方的衰亡。当第十五六世紀时，土耳其帝国在西亚細亚旧文明社会的廢墟上建立起来。他們充滿着新兴蓬勃的朝气，灭东羅馬帝国，席卷巴尔干半島，震撼德意志帝国。此时他們的科学、技术亦甚优秀。不过他們此时尚未为胜利冲昏头脑，当奥尔提利亚斯的地图在荷兰出現时，便立刻翻譯过来。到了末叶，他們即貪安乐而自大，对他国封鎖其国境，对于外界的进步閉目不視，自以为外界都和他們同样停止了进步。远东的土耳其就是清朝。滿洲八旗六万精兵，对内曾統治过龐大的中原社会，对外曾征服过准噶尔部的强兵，犹綽有余力。但是自从长发賊发生叛乱以来，却不得不在少数英法及欧洲各国暴兵之前低头請和。

然而欧洲朴素主义的文明社会，經過六七世紀之間，无形中蜕化为單純的文明主义社会。后来此种傾向日益显著，表现为社会的病症。此种病症与傳統的势力結合起来，在社会上深深扎下根来之时，乃轉化为与之相反的朴素主义。我所謂的朴素主义的提倡，在西洋首先是从所謂的“沒有的国家”，即“后进的国家”开始，盖非偶然。

文明生活在日本的年代相当久远。不过，文明生活开始普及于一般日本人民之間，其年代則較淺。日本民族年齡，可以說比欧洲任何民族都要年輕。吾人如决心实现近于完善的朴素主

义社会，并不如何困难。东洋社会之所以期待于吾人者，其在此歟？

（宫崎市定：《东洋朴素主义的民族与文明主义的社会》，第182—196页，傅仲涛译。）

## 五、赖德烈：论美国在东亚的“使命”

美国经过太平洋而不是大西洋来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事实具有深奥的意义。不祥的1941年12月7日并不是偶然的一日。它的来临肇因于一长串可以回溯到十七和十八世纪的大事。由于它们，美国业已日益加重地承担起积极参预远东事务的责任。使美国卷入当时在中国与西太平洋进行着的冲突中的政策不是任何个人、政府或政党的事。它反映一种象美国疆界向西移动那样的老的趋势，因此美国在远东继续不断地负担了责任，而这些责任是它在欧洲、或甚至在加勒比海以南的美洲不肯承担的，它的疆界跨过太平洋的趋势由于日本人攻击珍珠港和馬尼拉而加速，并且成为不可挽回的了。在击败日本的任务上，它所担负的分量比击败德国的更重。大战后落在美国身上的远东和西太平洋的问题及维持和平的任务将比欧洲问题更多。在未来的无数世代里，美国将被卷入东亚及其附近岛屿的事务里，它的范围将比牵涉到欧洲或甚至南美洲的更广。很少美国人清楚地意识到他们在历史上的越过太平洋趋势的含义。没有人能知道这个趋势的全部后果。当他们部分开始了解所发生的事情的时候，会有许多人想到要退出来，但是历史的进程会与他們相反的。美国可能会暂时不动，甚至象

在為自己脫身而作了些努力。如果它這樣做，絕對的可能性是它不會長久成功的。不管好壞如何，美國是已經在遠東了，而且還要在那邊呆下來。在未來的無數年頭里，它將更深地而不是更少地被卷進去。大問題不是美國應退出遠東，它不會的。真正的問題是美國政府在那個地區將遵循些什麼程序。

（賴德烈：《美國在橫跨太平洋移動》，序言，第7—8頁，孫瑞芹譯。）

## 六、賴德烈：論美國在橫跨太平洋移動

美國日益增多地參與遠東事務，是同美國歷史上最老的、最始終不變的、最強大的因素之一，即向西移動的邊疆，有密切關係的。其實，美國在遠東的突出地位大部分是這個向西推進運動的結果，而在某種程度上也是運動的原因。因為這一關係，美國在遠東及西太平洋的活動包含了特殊的、幾乎是不吉的意義。它預兆着美國在該地區的責任日益增多而不是日益減少，它說明這個不祥的事實：美國進入二十世紀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不是象本世紀的第一次世界大戰通過大西洋而是通過太平洋的。

這個對比是重要的，它是美國的動向不斷轉移的證據，美國在傳統上是嚮往歐洲的。它的大部分人口及文化中的主要成分來自歐洲。它的主要經濟關係曾是同歐洲的關係。它是西方世界的一部分，而歐洲是西方世界的歷史中心。那些日後成為美國的各地，在殖民地時代，自然而然地卷進有英國參加的歐洲鬥爭中去。新興的國家在獲得獨立以後努力不問歐事。事實上，不願卷入歐